

高岸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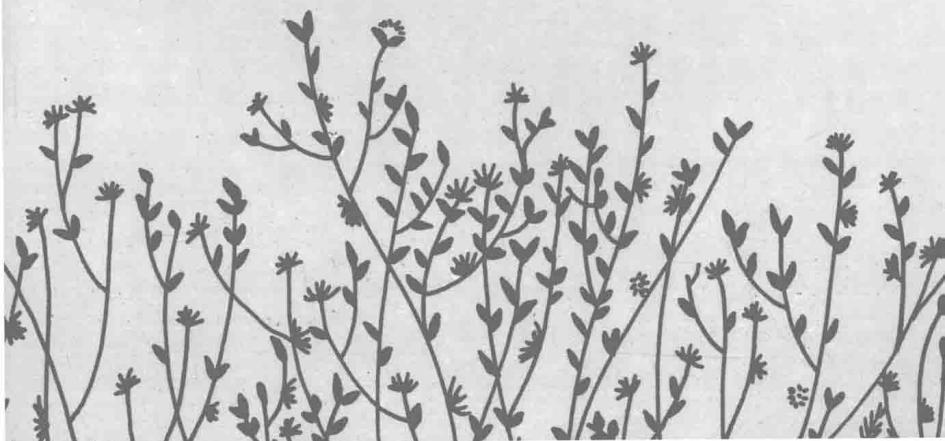
依旧多情



依旧多情

高 岸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2号

社 长 : 马森彪
总 编 辑 :
责任编辑 : 李建华

依 旧 多 情

高 岸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太原南郊区美术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25 字数:190千字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

ISBN 7—5378—1407—4

I·1385 定价:12.00元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描写老年人生活的长篇小说。

被人称为“马列主义老太太”的孙怡芹退休了。从整日忙忙碌碌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一开始还真有点不习惯。她和几位朋友一起筹划办起了老年大学，使许多老人们从寂寞中、从对死亡的恐惧中、从无可奈何中、从纷扰的家事中走了出来，找到了一个新的天地。老人们在这里学习绘画、舞蹈、烹饪、时装设计，生活充满了情趣，老人们觉得自己过得充实而愉快，他们对生活“依旧多情”。

本书作者原是著名评论家，研究鲁迅文体和当代小说文体有相当建树。他以独特的文体写小说近百万字。曾出版过长篇小说《世界正年轻》。本书是他的第二部长篇。

这部小说反映的是当代生活极为重要、极有特色的一角。作家文学功底深厚，对人物心灵的发掘相当深刻，笔调如行云流水，自有妙处。小说在刊物上发表后，颇得好评。主人公孙怡芹已走进社会生活，有些报刊文章已把她作为一种精神、人格的象征。阅读本书，读者可从中品尝出人生的百味。

高岸和他的小说

——代序

吕家乡

评论家搞起创作来往往往力不从心，眼高手低。《依旧多情》的作者高岸（原名李国涛）是罕见的成功者。他是在年近花甲的1990年由评论家变成小说界新秀的，开笔之后，竟一发而不可收，佳作迭出，8年来已发表短、中、长篇80多万字，引起广大读者和文坛瞩目。“高岸现象”成了许多人感兴趣的话题。一位作家在闲谈中说：“高岸的一些小说不但好，而且别人写不出来，因此可贵。有些人的小说虽然也好，可是别人也能写出来，就不足为贵了。”这是行家里手的精辟之论。我爱读高岸的小说，主要是因为它们大都连着作者的肺腑和性灵，其中有他对世事人生的独特发现和感悟，有他的无法装扮的“第一等襟抱”和高洁灵魂，是只有高岸才能写得出的“这一个”。

高岸的小说多属忆旧题材，所忆多故乡徐州旧事。他写了不少旧社会里或新旧交替时代的小人物，包括厨师、女佣、店员、粪夫、教员等等，他们既不同于鲁迅笔下浑浑噩噩的

阿Q,也不同于俄罗斯作家笔下那些灵魂枯萎了的灰色人物。大体而言(也有个别例外),他们虽然地位卑微,但生命史中却有持久或短暂的辉煌。他们虽然深陷泥淖,却能坚守“有所不为”的操守。他们虽然忍气吞声,却有自己的人格尊严。他们也许神情呆钝,却有丰富的感情世界。他们也许目不识丁,却可能身怀绝技。他们或以悲剧告终,那不是“无事的悲剧”,而是美被摧残的悲剧;或得到翻身,并不是单靠救世主的搭救,而且有自己的争取。作者给予这些小人物的,不仅是同情,还有尊重。这种独具特色的艺术创造,来自高岸的观察和阅历,也来自他的推己及人的自我人格投影。高岸是始终把自己置于小人物之列的。这里不妨说一点我所知道的高岸即李国涛这个小人物自己的故事。

1947年我和国涛同时考入江苏省立徐州中学高中部,是同班同学。我俩可以相互作证,当时谁都没有将来学“文”的打算,虽然都喜欢读点文学作品,作文也常受表扬。我崇拜的偶像是发明家爱迪生。国涛则是兴趣广泛,英语特佳,课外阅读了不少英语读物;又是篮球队的骨干,话剧舞台上的主角。他家住在市内的一条小街,从小与市井人物为邻。我从偏僻的农村初到城市,起初我和国涛关系一般。1948年冬淮海战役解放了徐州,在共同欢庆解放的热潮中增进了友情。1949年暑假,我偶然地提前考入了山东大学中文系;国涛则在高中毕业前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参加了工作,穿上了革命干部的制服。世界正年轻,我们正年轻,真是无忧无虑,朝气蓬勃。

1951年寒假,我回家路过徐州,原来的班主任、教语文

的陆承勉老师一见面就告诉我：“李国涛和××订婚了！”她是我们的同班同学，当时已考入了一个军工大学，那是要通过严格政审的。我和陆老师一样为这桩喜事而喜上眉梢。不料几个月后我返校又路过徐州时，陆老师告诉我那事吹了。什么原因他也不知道。三十多年后，历史进入了新时期，“同学少年”都入了老境，我见到了鬓发斑白的她，我以老同学的直率问起这突变的缘故，才知道是由于国涛的家庭“有问题”，领导上说，如果和国涛保持关系，既不能入党，也不能保留军工大学的学籍。即将履行入党手续的她作了在当时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可以想到，这种打击对于国涛该是何等沉重！以后国涛查出了肺结核，不得不疗养一段时间，其时他在山东泰山脚下的一个煤矿速成中学教语文。这里就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世界正年轻》的背景。1954年春天，我已分配到济南的一个工农速中教书，国涛曾去看我。他面色憔悴，那时候他好像已觉得只有文学这条路可走；除了卖力地教课以外，还在练习写作，迎着一封封扫兴的退稿信而坚韧不拔。

1955年“反胡风”运动后，我开始“运交华盖”，1958年进了教养所。这几年国涛的境遇、身体和心情都有好转。他和同事中的杨女士，经过比《清白》（高岸的中篇小说）还清白的长期交往，由友情而爱情，终成眷属。1957年暑假，夫妻一同调往太原的煤矿中学。大约是由于忙于调动，影响了“鸣放”的火力，国涛“差一点成为右派”，他只受到严格的批判而躲开了右派帽子。

读高岸的小说，使人感到一种或浓或淡的命运感，这和他的悲欢升沉的亲身经历不无关系。

1962年春天，我走出教养所不久，国涛辗转打听到我的地址，主动给我来信，恢复了中断数年的联系。他一如既往地坦率热诚，信中从不涉及我的政治遭遇问题，似乎没有这回事一样，既不给我劝慰，也不给我指教，只是谈诗说文，交流读书心得，或互通亲朋故旧的消息。那时他已由教师转为编辑，编一个理论刊物，约我写稿；我寄去一篇学习毛主席诗词的札记，很快刊出。1963年冬，我写了一个反映中学生生活的短剧寄给他，他来信大大夸奖了一番，并说“玉英（他的夫人）看了，也连连说好”。他就是用这种不动声色的方式给我以鼓舞和力量，助我走过了一段相当漫长的荒寒的人生旅程。在突出政治的年代，有几人能像国涛那样坚守超利害、超时潮的交友之道呢？有一次谈及此事，国涛却说：“这在民间，稀松平常！”民间，不就是“小人物”的所在么？

文革十年，又是音信隔绝。阴霾初散，他路过济南来看我，除了相互出示“伤痕”，谈得最多的是两位恩师之死：我们高中时代的英语老师奚建运在文革初期自杀，前面提到的陆承勉老师经受长期批斗后死于癌症。这两位老师都当过我们的班主任，深受我们尊敬，他们的影子在高岸的忆旧小说中曾多次出现。我记得这次会面时他给我带来了一大包坚硬如石头的饼干做为礼物，把友谊温暖和生活艰辛的信息同时传给了我。

《山西文学》复刊后，他调任编辑、主任、主编，同时致力于文学评论，两方面都显出了既投入又超脱的风格。据说国涛常把青年作者请到编辑部来商量对稿件的修改加工，有时国涛还亲自动手改写一些片断以作示例。（他和别人都想不到这会成为他以后写小说的练笔。）《山西文学》上常用国涛

写的“编稿手记”，从中可以想见国涛对于编发的稿件反复揣摩玩味之情。前贤说劳动具有谋生、奉献、乐生等三种意义，可以说国涛的编辑工作达到了“三合一”的地步。与此同时，他对文学的研究（从《野草》研究扩展为鲁迅文体研究，又进展到当代小说家的文体研究）越来越深入，文章越写越不拘成规，显得洒脱灵动，宛转自如。文学研究和评论已成为他的精神漫游。

谁也没有想到，在年近花甲的1989年冬天，李国涛竟决心“洗手改行”，弃评论而转向小说创作，不过都用了高岸的笔名。不少朋友为他惋惜和担心，因为他在评论上已颇有成就，且正在蒸蒸日上，而创作能否成功却并无把握。然而高岸决心下定，毫不动摇，听从心灵的召唤，成败得失在所不计。也许正是这种符合文学本性的心态保证了高岸的成功，并且决定了高岸在文心和文体上的特色：既非“玩文学”，也无意搞什么“探索”或“实验”，没有模式，没有旗号，只是娓娓道来。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他的一篇篇接连问世的小说，大都在心中经过了长期孕育，已到瓜熟蒂落的火候。知情人还看得出，它们大都是高岸心灵的象征，精神的自传。“文如其人”未必是普遍规律，对于高岸却是适用的。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高岸，说来已是将近50年的历史。

除忆旧小说外，在《依旧多情》之前，高岸也发表了几篇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作品，看来后一类尚未做到得心应手，因此水平高低不齐。写当前城市离退休老人生活的这部长篇《依旧多情》却发挥了他的特长，写起来如鱼得水。高岸的抒情散文《说老年情怀》中那个迷人的“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意象，在这里还原为老年人最为敏感的命运之神发出的信息，

弥漫于全书，构成了沁人心脾的氤氲。书中主角“马列主义老太太”孙怡芹简直就是高岸的化身。福楼拜说“爱玛（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高岸也可以说“孙怡芹就是我”。孙怡芹退休之后对老年大学的工作那样热心，以至于“为了带头”破天荒地登台做服装表演。在她带领下的老年大学学员们，像孩子们迷恋游戏一样，迷恋于学跳舞，练书画，搞服装设计，兴致勃勃地筹备和举办书画展览和服装设计展览。为了什么呢？不为名，不为利，连“延年益寿”也常常不在他们的意识之内，只为了“得到愉快。摆脱孤独，忘记衰老和死亡，感觉生活的滋味，——就是这种愉快的内容”。这种既投入又超脱的境界，不正是高岸的“老年情怀”和一贯的精神追求的投射么？作者让自己和读者跟这些老顽童们一起沉入各种的活动，津津有味，兴致盎然。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却有耐人咂摸的意趣。为了细细品味老年的人生景观，作者的目光和笔触缓缓移动，致使结构和语言如行云流水一样悠闲舒展。我觉得高岸似乎学得了《红楼梦》和《洗澡》（杨绛）的某些神髓。只要不是太性急的读者，是会喜欢这本小说的。

在《依旧多情》出版单行本之际，高岸嘱我写一个序言。我既非前贤，又非名流，实不敢当。高岸说，这“是为给将近五十年的友情留个纪念”。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无法推辞，于是拉拉杂杂地介绍了一些我和高岸交往中的片断印象，这些“背景材料”不知是否对读者有点参考作用？

1995年10月于济南

第一章

孙怡芹近几年被人称为“马列主义老太太”，前年办了离休手续。她这次离休，也被称为一次“革命”。这玩笑话里并不都是讽刺。

那一阵子动员老干部办离休手续不那么简单，许多人不愿意退；或者退以前提许多条件。孙怡芹自己是区人事局的副局长，这里面的门门道道知道得多。她还是市委老组织部长（在文革后去世）的妻子，上面有一些关系。谁知道上级一同她谈话她立即答应离休。她说：

“到点到站，该退就退，有制度。别人退不退咱管不了，咱按制度办。遵守制度，这也是革命。”

这话传出来，有人就说马列主义老太太最后又革了一次命。

谁知孙怡芹的这份工作一时还真不好接。这又是人事工作，不能有一点差错。没法子，上级又找孙怡芹谈话，说是想来个“反聘”，让她再把手里的业务管起来。其实孙怡芹心里明白，起初上级谈话时并没有估计到她会答应得那么顺利，也没想到手续办得那么利索。现在她已经是一位离休干部了，再来干，干什么？

那位同志说：

“你看，老孙，你是老副局长了。现在办了离休手续，再回去，这职务……就不好……不好继续担任了。……是不是？”

“当然，”孙怡芹说：“哪有不在编的人员担任领导职务的？”她的业务熟得很，讲的都是行话。

“是，是。”那位同志为谈话的顺利进行，简直兴奋起来了，说：“不好担任领导了。”

“我只做那份具体业务。——我服从局长和副局长的领导。”孙怡芹说得轻松，似乎带一半开玩笑的意思。但是她不大会开玩笑，最后又说，“真的！”

“老孙，你是十年的老副局长，局里的人谁不听你的？”

“不不，不再说这些事了。”

这么着，孙怡芹又上了两年班。有几个调皮的青年人说，马列主义老太太又“复辟”了。

今年十月，那几个调皮鬼用了个“二次革命”的怪词儿来述说孙怡芹的离去。这里面有调皮捣蛋嘲讽世事的流行心理和油腔滑调嘴尖皮厚的玩世不恭。但是，这里面总还带着一点点，哪怕是很淡薄的一点点敬畏之情。一个年近60的老太婆，上班一分不迟，下班一分不早。许多事儿替他们干了，许多事儿为他们成全，还有许多事儿为他们瞒着，他们谁不明白呢？

所以，孙怡芹走后的第二天，有个姑娘就看着那把空椅子说：

“这么样的老太太，不好找！”

另一个小伙子接上：

“马列主义的嘛！”

再一个中年干部问那个姑娘说：

“你要找个婆家，有这么个婆婆怎么样？”

那姑娘说：

“我不要这样的婆婆。喂，这样的领导其实还真不错。只要她是真正的马列老太太。”

那个小伙子说：

“我妈也有点这样。”他转头向那姑娘说，“你别以为这样的婆婆就不好。”

姑娘羞了，说：

“放屁，你占便宜！”

孙怡芹离休以后这两年骤然老了。

也许这本是自然法则。

孙怡芹最近两年到医院去看病，就经常听见大夫向她提这个“老”字。那大夫姓李，同孙怡芹很熟。孙怡芹“小李、小李”地叫惯了，其实李大夫也近40岁。李大夫一面等着孙怡芹解开钮扣以便听诊，一面就笑着说：

“老孙，手上有老年斑了呀。”

孙怡芹当时就往自己手背上瞥了一眼，原来是两点大体呈圆形的痕迹，微微发光，浅褐色。两只手上都有，都有。其实一年前就有了，她不以为意。她不知道这叫“老年斑”。她以为只有在脸上生着一块一块黑褐的斑，那才是老年斑。哦，原来它悄悄地走上自己的手背。老了。脸上有没有呢？她可是真不知道。她不大照镜子，尤其不怎么端详自己那张枯瘦多皱的面孔。她往往只瞧瞧头发是否蓬乱。头发上有了白发，这已经有十年了。

老年斑。其实她们家乡话称之为“土斑。”土斑，说明人已到了重归于土的时候。

她的双手敏捷地解着钮扣，她干什么事都很敏捷。她同时笑着回答：

“能不老吗？——你都40了吧？”

“整40岁，您记得清楚呢。”

“怎么不清楚呢？每份经手的人事档案，我都能记得熟。领导随问随答。——那时候的人事干部，业务可熟了。——所以记住你！”

她们都笑了。

李大夫拿起听诊器去听以前，忽然又贴近地望了望孙怡芹的眼睛，说：

“唉，老孙，眼上也有老年环了。”

“老年环。是病吗？”她问。李大夫说：

“正常的，老年人瞳孔周围都要长这种环。”

噢，正常。

噢，正常的老年。

李大夫诊断后告诉她：

“老年性气管炎。——没什么。多注意，少着凉。”

李大夫开了些药给她，最后却说：

“心脏怎么样呢？”

孙怡芹明白，李大夫关心的是她的冠心病。她说：

“近来还好。”

“气管上的问题不大，老年性的。心脏更重要。”

所以，孙怡芹逐渐体会到：老已来临。

以前挤上公共汽车，没人给自己让座。近来就有几次，人们说：“老同志您坐。”“奶奶您坐。”“老太太请坐吧。”不多几次。

不过没有雨雪的时候，除了隆冬季节以外，她还是骑着那辆永久牌坤车上班下班。

办公室在一个六层大楼里的第五层。她上楼时开头敏捷。上到第三层便觉有点气短。不是不能再快些，而是不敢。冠心病。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机关的节奏比五十年代要缓慢多了。何必呢？

这么想着，她推开办公室的门。并不先坐下，而是先推开窗子。然后整理头巾、手套或者提包什么的。然后打来一盆冷水，擦抹桌子，自己的桌子和相邻的桌子。再远一点的桌子就不去给他们擦了，——自己毕竟已不是青年团员，老了。自己的茶杯是昨天下班以前已经倒掉，涮过的，现在再从暖壶里倒出些过夜的开水涮一下。然后便提着两个暖壶到楼下茶炉房打开水。她提两个壶去。要在以前她当然把四把壶都提走。不是老了吗？不是冠心病吗？不是一路骑车热了累了想泡一杯花茶喝喝吗？

她提两壶开水又上了楼，进了办公室，这时差不多正好有人送来签到簿或考勤簿，放在一进门的桌子上。她大约总是第一个把名签上，然后去泡茶。这以后，上班的铃声才响，人们才纷纷到来。大约一刻钟以后，又有人来收回那个考勤簿或签到簿。大家冲上热茶，有人取出早点来吃。打毛衣、看报或谈家务。总要一个小时以后才静下来，办公。办公到十一点左右，人们一个一个地消失，最后只剩她一个人，手头的事还没有办完。

对面桌上的那位小伙子叫卢永，上班比较早。一来先签到，然后就找过昨天下午来的晚报看，看得很仔细，也不喝水。等到另外两个人的早点吃完了以后，他看看手表说（好

像也不专门向某一人说)：

“我出去一会儿。”

另一个桌上那姑娘说：

“吃早茶？”她不说：“吃早点”，有微讽之意。

卢永笑笑，把西服抖一抖说：

“什么吃早茶，我肚子还空着哪。”

姑娘说：

“空着肚子好呀，广东酒家的小茶点可以多装一些。你这早茶晚酒，比咱区长不差什么。”

卢永这时总向孙怡芹说：

“她的嘴头子越来越损。老孙，我过一会儿就回。我不能失约，是不？”

卢永的意思是请孙怡芹给他招呼着点儿什么事。孙怡芹理解地点点头。卢永向那姑娘做一个鬼脸，走出去。他往往在办公室里的人都快走光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十一点前后才回来。这倒好，办公室里也倒换着有两个人。不过他回来不久，往往又有电话把他叫出去。来来去去，一身酒气。

人们说，卢永在外面有点生意做。卢永穿衣吃饭都同别人大不一样了。开放的大趋势嘛。

机关里下午的情况更糟一些。

大约在四点半以后人们便渐渐散去。到五点，都走的差不多了。五点半以后，六层大楼里咳嗽一声都有回音，怪瘆人的。

你想不到一座大楼能静到这种程度。或者不说是六层大楼，只说第五层吧，人影没有，鬼影也没有。整顿过，教育过；开过会，下过文件。无效。或者说无持久之效。

自己是一个离休回聘的干部，还有什么说的呢？——没有话说。没有话说可以有行动。孙怡芹无论冬夏，不管上午下午，一定要工作到下班时间才离开。她能管得住自己。她觉得下班时候比上班时候更显得惨淡。上班时五层楼里也是没有人，不过你能期待，能想象到再过十分钟二十分钟，人们会来到，机关会活起来；寂静会消失。但是下班时寂静会把你闷死。寂静已经把你浸泡腌渍了很久，最后还是看着你孤零零地自己提一个黑手提包在宽宽的楼道里走去。寂静会嘲弄你，说：你还没有泡僵腌麻吗？明天此时，再泡你，再腌你！——五十年代，一到下班时间干部们疲劳又兴奋地涌出办公室，互相争论着什么，交待着什么，约定着什么，那景象早已没有了。

终于有一天下午，夕阳把又稠又浓的桔红色抹满一面白墙，正是五点刚过十分时，孙怡芹把一件人事档案装进袋里，办完一件重要的手续，忽然觉出一种恐怖。恐怖由另外一个办公室的电话声引起的。

电话蜂声器响，没有人接。

电话蜂声器极有耐心地响着，从锁紧的门缝里传出来。那声音在空旷的走廊上回响，频率极密地震颤。没有人接电话。当然没有人接电话。而且也没有人会听到，——除了她一个人。

蜂声器像哭泣似地又响一阵。蜂声器连续的颤音使孙怡芹突然感到心脏也轻微地颤动起来。她有点吃惊。但是她立刻清晰地作出判断，这不是冠心病发作，因为没有伴随而来的胸闷、冷汗和疼痛。这只是神经衰弱的表现。等到蜂声器终于绝望地停止了呼唤，一切又归于寂静的时候，心颤也就